

# 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

● 印紅標

紅衛兵有許多整體特徵，但是，聚集在紅衛兵大旗之下的，並非始終如一的統一整體，而是具有不同思想和行為傾向、互相矛盾和衝突的派別，如「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極左派等等。本文是對先後在紅衛兵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老紅衛兵和造反派<sup>①</sup>兩大潮流，進行初步的疏理分析。

## 歷史的軌迹

### 老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從文化教育界打開突破口。文革前夕，毛澤東多次指責教育界。1964年、1965年，毛澤東對毛遠新、王海蓉講：「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學校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帶頭造反！」1966年5月，他又說：「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些講話實際上是向青年學生發出了造反的動員令。毛澤東的指示雖然沒有立即全文公佈，其精神卻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傳達或傳播到學生中間，小道消息往往比報刊和學校領導的報告更迅速、更準確。而幹部子女消息靈通，反應格外強烈。一位參與發起第一批紅衛兵的人回憶說：「當時我們認為工農階級掌握了政權之後，在教育 and 知識領域仍然得聽命於那些解放前就有優越條件，並且解放以後依然如故的高級知識分子及其子女，就一直有一種壓抑感，也不服氣。……在那前前後後，我們經常傳閱，或在一起，很小範圍地議論主席的批示、與毛遠新的講話、與王海蓉的講話，當時我們非常願意

聽，覺得非常入耳。」<sup>②</sup>很多學生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期待着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成長為革命接班人，一些幹部子女尤其急切。在醞釀對教育界的批判中，形成了激進的政治小群體。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這些學生聞風而動，激進的學生群體演變為紅衛兵組織。

「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sup>③</sup>紅衛兵在第一篇論述造反精神的大字報中，揭示了他們造反的直接目標。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6月6日的大字報宣稱：「我們同黨支部的分歧，決不是甚麼個人同組織的分歧，而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同資產階級保皇派爭奪教育領導權的鬥爭」，紅衛兵號召學生們「向教育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sup>④</sup>

他們認為，進行文化大革命，必須有一支敢於造修正主義的反、捍衛紅色江山的階級隊伍，以往聽命於學校領導的共青團難以擔當此任，必須重新組織一支階級隊伍。「我們要造反，要奪權，要組織階級隊伍幹革命，就是要大講階級路線，就是要看成分！」<sup>⑤</sup>這支「看成分」的、由「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組成的階級隊伍就是紅衛兵。

以上是紅衛兵最初的旗幟：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建立革命後代的階級隊伍。圍繞前者的爭論很快得見分曉，學校領導癱瘓了，被工作組取代了。而後者引起了激烈爭論。1966年6月，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傳出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sup>⑥</sup>。7、8月間，開展了關於對聯的辯論。這場辯論，如果也能稱作辯論的話，是喚起了許多紅五類子女虛狂的優越感，動員他們站到了紅衛兵的旗幟下，同時傷害了非紅五類子女的起碼自尊，在學生中劃出了一道鴻溝。唯出身論，實際上是一種血統身分論，儼然成為紅衛兵的組織原則，紅衛兵帶着血統論的胎記風靡北京，馳騁全國。以後，成立早些的紅衛兵，特別是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檢閱之前成立的紅衛兵稱自己為「老紅衛兵」。

## 造反派

如果說老紅衛兵的興起是向教育界發難，以唯出身論拉隊伍的話，那麼造反派則是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擊領導幹部、「當權派」起家，以「平反」和「平等」為旗幟。造反派指責工作組領導學校運動期間把普通群眾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要求工作組回校作檢查，為被打擊的群眾徹底平反。造反派抨擊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和老紅衛兵掌權後繼續打擊學生群眾，偏袒工作組，說他們用血統論排斥非紅五類子女是搞特權，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造反派反對依據家庭出身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主張所有學生都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的社會地位。大學生造反派偏重於要求工作組為他們平反，關心與工作組領導人政治地位緊密相關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等政治問題。而中學生造反派更重視平等地位，關心與此相聯繫的反特權問題，具有更多的社會性。

平反、平等的要求，反對打擊群眾、反對特權的主張哀而動人，喚起了社會中下層許多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動搖了領導幹部是人民利益代表的道義和政

老紅衛兵認為，進行文化大革命，必須有一支敢於造修正主義的反、捍衛紅色江山的階級隊伍，以往聽命於學校領導的共青團難以擔當此任。

造反派抨擊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和老紅衛兵掌權後繼續打擊學生群眾，偏袒工作組，說他們用血統論排斥非紅五類子女是搞特權，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

治地位。「無產階級司令部」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厲批判，剝奪了第一線領導幹部是共產黨正確領導化身的權威性，摧垮了當權派的思想和政治戰線。原來被視為思想落後、有問題、甚至反動的學生，成了革命派、左得出奇的造反派；而一批老革命、一向有權給別人定性、劃左、中、右派的領導幹部，反倒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當眾作檢討：革命後代、紅衛兵反不如非紅五類、「狗崽子」革命！多年以來，以及文革初始形成的左派右派、先進落後、是非曲直觀念被造反派打了個天翻地覆，大有「革革命者命」的勢頭。

## 鬥爭方向

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爭大方向」也不盡相同。老紅衛兵最主要的活動是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破四舊」，以及批鬥「舊北京市委」、文化教育界的「黑幫」、共青團領導工作組時期的「路線錯誤」等：打擊的對象主要是所謂「牛鬼蛇神」和「黑幫」。「牛鬼蛇神」包括長期被作為「團結、教育、改造」對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革開始後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反動文人」的知識界人士，如眾多專家、學者、文學藝術家、教師等等；長期作為專政對象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種人，即「黑五類」；長期被作為教育、改造對象的資本家以及被認為曾經為舊政權服務的人，如前國民黨黨員、舊軍人、舊警察、宗教職業者等等。「黑幫」主要指當時被打倒的，或受到批判的舊北京市委、教育、文化部門的領導幹部。

一般地說，老紅衛兵的主要鬥爭對象在共產黨外、非「當權派」。對於黨內，只是打擊少數，打擊那些被認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為資產階級代理人

1966年，北京小學生為紅衛兵準備大字報。



的人。老紅衛兵相信黨政軍領導體系中的大部分幹部是好的，是應當保衛的，他們始終警惕着右派假借造反之名衝擊政權的主體，他們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造反派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鬥爭對象則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實際上是普遍衝擊共產黨、政府甚至部分軍隊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他們對大部分領導幹部的優劣持懷疑、審視態度，他們認為走資派本身即是新生資產階級，而不僅僅是黨外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文革運動打擊的重點。造反派的運動造成了建國以來對黨政軍領導體系和領導幹部空前的巨大衝擊。

造反派也打擊其他「牛鬼蛇神」以及與對立派群眾組織進行派性鬥爭，但是這些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

## 衰落

老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兩個浪潮的衰落均由於違背毛澤東「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意志，然而又各有其故。

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支持老紅衛兵顯然是賞識他們打破既成秩序的造反精神、他們與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下的工作組存在的摩擦和對抗、他們所提供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的組織形式。與此相比，對紅五類子女拉起階級隊伍的主張卻有所保留。毛澤東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說：「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1966年8月6日接見紅衛兵時說：「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甚麼呢？首先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次是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我聽說你們為一副對聯爭執不下」，對於這副對聯，「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講了，很簡單，那種封建術語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覺得應該不在枝節問題消耗精力，大敵當前，要對付敵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sup>⑦</sup>。

文革領導者努力把紅衛兵引導到與黨內鬥爭相呼應、相配合的軌道，但是老紅衛兵頑強地表現自己的追求，在他們心中，革命後代的階級隊伍是比批判「錯誤路線」更有分量的事情，革命後代的群體認同感，「樸素的階級感情」很快超越了對工作組評價上的分歧。以批評工作組聞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與保護工作隊的清華大學紅衛兵成了一個戰壕的戰友，8月下旬，他們共同行動，在清華園內外「破四舊」，撕去了校園內炮轟劉少奇等領導人的大字報。8月20日，北京工業大學一名學生在辯論會上演講，把當時流行於幹部子女中的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怨恨、對唯出身的讚賞、對造反派揪鬥工作組、衝擊領導幹部的憂慮和憤怒有機地聯繫起來，表達得淋漓盡致，得到了老紅衛兵、保守派學生以及某些面臨危機的領導幹部的讚揚和推崇。可以說這篇在全國範圍內廣為印發的講話，是老紅衛兵和保守派學生的共同宣言。

在「紅色恐怖」的1966年8月，老紅衛兵向社會、向黨外猛烈出擊的「破四

老紅衛兵的主要鬥爭對象在共產黨外、非「當權派」。對於黨內，只是打擊少數，打擊那些被認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為資產階級代理人的人。

文革領導者努力把紅衛兵引導到與黨內鬥爭相呼應、相配合的軌道，但是老紅衛兵頑強地表現自己的追求，革命後代的群體認同感，很快超越了對工作組評價上的分歧。



「文革」初期，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聯署的大字報，被毛澤東讚為「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其後，她一度成為「文革」紅人。圖中聶元梓旁為陳伯達。

舊」熱浪幾乎淹沒了批鬥黨內走資派的主題。10月，文革領導者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把群眾運動的矛頭重新引導到揭批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方向。這時，老紅衛兵卻感到了空前未有的困惑，他們在造反派對當權派大規模的衝擊面前猶豫了，退縮了，保守了。他們無法接受這樣多的領導幹部，其中包括他們自己的父母和最接近、最尊敬的革命前輩，被當作運動對象質問、揪鬥：他們無法容忍那些出身「有問題」、政治「不可靠」，至多是團結對象的學生對老幹部、對老紅衛兵說三道四、橫加指責。他們不論從情感還是從理智上都無法接受這樣的「革命」。他們本能地認為這是「右派翻天」、「狗崽子翻天」。他們與造反派勢不兩立，當發現造反派的靠山是曾經支持過他們的中央文革小組時，他們開始對中央文革小組懷疑、不滿，這時的江青已經不再是當初捧他們為「小太陽」的「江青阿姨」了。強烈的壓抑感終於在12月匯成抗爭的潮流，紅衛兵的發起者組成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對文革的「新動向」發起了抨擊：「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誰敢亂捕革幹革軍子弟小心狗頭！」、「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

老紅衛兵從文革之初狂熱的促進派、造反者，變為懷疑派、保守派、反對派、逍遙派，他們的命運也從天之驕子、「小太陽」變為「做了壞事的小家伙」、階下之囚。毛澤東說：紅衛兵也是不斷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變成反革命<sup>③</sup>。

老紅衛兵衰落的過程就是造反派興起的過程，造反派因為作了中央文革小

組的「鐵拳頭」而紅極一時，取代了老紅衛兵。但是，造反派藐視權威、自行其是的無政府獨立傾向，唯我獨左、黨同伐異的宗派傾向使文革領導者不安。「無產階級司令部」為此多次勸誡忠告，先後要求通過整風、軍訓、辦學習班、「鬥私批修」等辦法加以解決，但是收效不佳。造反派紅衛兵一旦形成龐大的政治勢力，就必然爭取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他們甚至對不利於自己的毛澤東指示也歪曲理解，各取所需。他們可以成為衝垮「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破壞力量，也可以成為重建新的政治秩序的障礙。1967年夏季，造反運動達到「天下大亂」、「全面內戰」、部分失控的程度。毛澤東發出了警號：「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sup>⑨</sup>一年以後，毛澤東斷然派解放軍、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用類似派工作組的方法，結束了紅衛兵運動。造反派紅衛兵的頭頭在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以後就逐步喪失了權力，其中很多人在1968年以後，特別是1970年以後進行的清查「5·16」運動中受到了政治上的清洗和打擊。

## 政治主張

### 「革命」理論的分歧

老紅衛兵的醞釀開始於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們的思想受着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觀點的深刻影響，他們強調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奪文化教育領域的領導權，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打倒「黑幫」、「資產階級代理人」。他們突破了文革以前進行群眾性政治運動的通常形式，率先提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創立了政治性群眾組織——紅衛兵，提供了自下而上發動群眾的具體方式，採取了非理智的暴力行動。老紅衛兵首創的許多事物成為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內容。

然而，當文革領導者引導群眾以普遍衝擊領導幹部的方式摧毀所謂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時候，他們驚愕了。他們理解的走資派是文教部門及北京市委少數部門的「一小撮」「黑幫」，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超越了他們的期待，危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在走資派這個文革運動和繼續革命理論的中心問題上，與「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解釋和指導發生了分歧和抵觸。

造反派先是在受到政治打擊、排擠、冷落，繼而是在普遍衝擊領導幹部的報復性行動中理解和接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他們在理論上走得很遠，他們普遍熱衷於「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論點。這些論點不僅老紅衛兵不願接受，就是在1967年夏季以後，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不再重提。造反派對群眾直接選舉產生權力機構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眾組織代表能夠直接參與其中並分享權力的革命委員會抱有很高的熱情，對官僚主義、特權、血統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期待以革命化、大民主的精神對政治體制進行某些改革。

老紅衛兵受「以階級鬥爭為綱」觀點的深刻影響，然而，他們在走資派這個文革運動的中心問題上與「無產階級司令部」發生了分歧和抵觸。造反派是接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期待以革命化、大民主的精神對政治體制進行某些改革。

## 圍繞「血統論」的鬥爭

文革以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不斷升級，在學校工作中愈來愈強調貫徹階級路線，實際作法就是愈來愈看重家庭出身。來自「革命家庭」、「工農家庭」的青年享受優待，生於「反動家庭」、非紅色家庭的青年受到歧視、冷遇。但是直到文革前夕，這種不公平的政策傾斜還是有限度的，在重視家庭出身的同時，又強調本人的政治表現。

文革開始以後，老紅衛兵指責學校領導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突出的一條「罪狀」是沒有貫徹「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於是就有了「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對聯提出的接班問題，意味着權力、社會地位以及財富的繼承，這對於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對聯實質上是要求在兒女輩複製父輩的社會政治關係，依據血緣關係謀求社會政治特權，紅五類的子女是當然的骨幹，掌權的領導幹部子女依然掌權。一篇名為〈自來紅們站起來了〉的文章講得直接了當：「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sup>⑩</sup>應當指出的是，對聯所追求的繼承是「階級的」、群體的繼承，紅五類的「類」的繼承，社會身分、等級的繼承，而不是家族的、私人的繼承。在政治上，它所鼓吹的是權力世襲，就是老紅衛兵講的：「幹部子弟要掌權！」、「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sup>⑪</sup>

工作組在學生中強調家庭出身，重視培養紅五類子女，在高、中級幹部子女集中的學校，工作組領導下組建的文革委員會大多由高、中級幹部子女掌權，其作法已超過文革前的左傾偏見。但是工作組認為對聯太片面，不利團結多數，不符合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一貫政策。中央文革小組領導者先是說對聯是封建主義的語言，不利團結，勸紅衛兵放棄辯論，後來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周恩來、林彪、毛澤東（左起）在天安門城樓上。



又明確譴責這是血統論，提出高級幹部子女不要擔任紅衛兵的負責人。林彪等人沒有對對聯作評價，但是在造反運動結束以後，他們聲稱「子承父業何罪之有？」允許軍隊幹部推薦子女或熟人的子女走後門參軍，回避艱苦而前途渺茫的上山下鄉，開大規模走後門的先例。

造反派猛烈地抨擊唯出身論，溫和者說這違背黨的政策，壓制群眾，激進者說這是搞封建特權。大批受血統論欺侮的青少年，包括出身「黑五類」、「牛鬼蛇神」家庭的學生，在對血統的批判中投入造反派的隊伍。時至今日，不少人在抨擊「太子黨」時，仍聯想到「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喧囂，視老紅衛兵不成功的表演為「太子黨」謀求權力的第一次嘗試。

造反派反對官僚、特權，要求平等的革命權利，要求參加文化大革命，加入或自行成立群眾組織的權利。在「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口號下，革命、造反的權利意味着社會地位被承認，平等的革命權利即是平等的政治權利的體現。然而問題還有另外一面，爭取平反和平等的要求與參加文化大革命相聯繫，以批判鬥爭走資派，不給運動對象以平等權利為條件。很多人從爭取自身解放的樸素要求出發，參加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報復、泄私憤，對別人實行非人道的壓迫，或者在爭奪權力的角逐中不擇手段。被迫害者可能變為迫害狂，條件是錯誤的思想和行為導向，文化大革命正是提供了這個條件。文化大革命宣揚的一套使人們相互敵對的理論，實行的一套推動人們互相廝殺的機制，造成了全民族的內亂和災難。

## 對反資本主義復辟的不同理解

老紅衛兵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舊中國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上。他們對地主還鄉團、國民黨捲土重來，保持高度警惕，在他們看來，復辟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他們相信，「反動學術權威」正在像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分子那樣，為顛覆共產黨的政權製造輿論。他們樂於講老一輩革命者的鬥爭歷史，搞憶苦思甜。他們在「破四舊」活動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階級敵人收藏着「變天賬」——土改前的地契、舊政府的委任狀等等。在青年一代中，他們強調家庭的階級烙印，認為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最容易受仇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反動思想的影響，與家庭劃清界限猶如脫胎換骨之難。而紅五類子女從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就會站在共產黨一邊，即使不是「自來紅」也是根紅苗正，本質好，是今後掌權的革命接班人隊伍的主體，骨肉親情被當作保證紅色江山不變顏色、反修防修的一個重要條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於污泥，怎能一塵不染？幾千年來，地主老爺傳宗接代，維持統治，還不是靠家傳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sup>⑫</sup>

造反派也高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卻另有一番道理。他們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新生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之上，他們更傾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典型是蘇聯，是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蛻化變質，由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變為壓迫人民的官僚特權階層。「掌着共產黨的權，

造反派很多人從爭取自身解放的樸素要求出發，參加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報復、泄私憤，對別人實行非人道的壓迫，或者在爭奪權力的角逐中不擇手段。文化大革命宣揚的一套使人們相互敵對的理論，實行的一套推動人們互相廝殺的機制，造成了全民族的內亂和災難。

老紅衛兵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舊中國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上。他們對地主還鄉團、國民黨捲土重來，保持高度警惕。造反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則是建立在與「新生的資產階級」，即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蛻化變質，進行鬥爭的基礎之上。



卻像國民黨一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當官作老爺。」<sup>⑬</sup>這種復辟不必改變共產黨的名稱，不必「扶持所有的政治殭屍」，不必「請蔣介石回來實行獨裁，也不必讓原來的剝削分子發號施令」，就使國家的性質改變，使人民重受剝削壓迫<sup>⑭</sup>。因此，問題的中心在共產黨內，在於保持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不變修正主義。他們相信，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依靠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走資派，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淨化當權派隊伍，是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不改變顏色的主要方法。在同齡人中，造反派認為謀求特權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開始。「由於革命勝利，三大差別存在，修正主義舊制度帶來的既得利益和種種特權，使幹部子弟遠遠脫離廣大工農群眾，非常缺乏工農感情，容易滋長起貪圖享受、害怕艱苦、好逸惡勞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特權思想。」<sup>⑮</sup>「聯動的騷亂告訴我們：沒有改造好的高幹子女是資產階級復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繼承人。」<sup>⑯</sup>

老紅衛兵對「保證鐵打江山永不變色」的理解偏重於保證老一輩革命者的領導地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被顛覆，重視血緣親情的作用。造反派紅衛兵的理解偏重於保證領導人的公僕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重視反對特權、重視群眾性大民主的作用。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從各自的角度闡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從中尋找證明自己的依據。但是，由於毛澤東這一理論本身的荒謬，他們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謬誤。

## 個人崇拜

紅衛兵以狂熱的個人崇拜著稱，但是，如果把紅衛兵的思潮僅僅歸結於個人崇拜的產物，就過於簡單化了。紅衛兵醞釀時期，他們堅信自己是響應毛澤東的召喚，去做敢革命敢造反的「孫猴子」，「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sup>⑰</sup>。毛澤東熱烈地支持他們時，他們高呼：「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但是，當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新階段與他們的設想和既得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困惑了，遲疑了。很多老紅衛兵滿腹疑慮，一廂情願地期待，或迫使自己相信毛澤東站在自己一邊，問題僅僅出在中央文革小組幾個文人身上。個人崇拜降溫了，只表現在不願貿然相信毛澤東犯了錯誤。而一些敢作敢為、思想敏銳的紅衛兵頭頭，則已經感到了崇拜的危機。一位第一批紅衛兵的發起者說：「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錯了，就是主席領導不得力。」另一位則憤憤然道：「現在我跟不上毛主席，這輩子也不想跟了！」<sup>⑱</sup>

造反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樣與他們的利益緊密相關。造反之前，就社會地位而言，毛澤東是高居雲端的被神化的領袖，對毛澤東的熱愛是抽象的、泛泛的。而當毛澤東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他們平反以後，他們才真切地感到了毛澤東的可親可近可敬，發自肺腑地感慨道：「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覺主席親。」這裏的個人崇拜帶着明顯的政治功利的色彩。確實，造反派翻身以後緊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敢打敢拼。但是為着自己山頭、派別的勢力和權力，他們又對毛澤東要門私批修、要文鬥不要武鬥、大聯合等指示各取所需，甚至置若罔聞。

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幾乎是清一色的幹部子女。老紅衛兵主要反映幹部子女的價值取向。工農子女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追隨者、跑龍套的角色。造反派紅衛兵的家庭背景最大的特點是基本來自不當權的社會階層。

## 社會背景的差異

### 家庭出身

老紅衛兵創建伊始，就打出階級路線的旗子，提出家庭出身問題，這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老紅衛兵由「革命後代」、紅五類子女組成。實際上是以領導幹部子女為主幹。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幾乎是清一色的幹部子女，老紅衛兵主要反映幹部子女的價值取向。工農子女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追隨者、跑龍套的角色。由此不難理解為甚麼批判血統論和特權以後，工農子女紛紛脫離老紅衛兵，另起爐灶。而能够在困境中堅持老紅衛兵旗幟，與中央文革拼死抗爭的只剩下幹部子女。



文化大革命宣揚相互敵對，推動人們互相廝殺，造成了全民族的內亂和災難。

造反派紅衛兵的家庭背景比較多樣，與老紅衛兵相比，最大的特點是基本來自不當權的社會階層。在大學，那些敢於和工作組衝撞的學生常常是紅五類出身，形成造反派組織以後，吸收了各類出身的學生，但是高級幹部子女非常罕見。血統論在大學生中市場不大，文革前三、四年貫徹階級路線的結果，已經使大學生中家庭出身「好的」所佔比重上升。大學生爭論的中心是工作組問題，而不是血統論的對聯。

中學生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學生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由於入學時基本沒有家庭出身的限制，在一些錄取分數線高、升學率高的重點學校，幹部子女、各類職員(包括知識分子)子女、有家庭文化薰陶的舊統治階級子女的比例遠遠高於他們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例，而工農子女的比例很低。血統論的對聯在中學影響很大，是老紅衛兵與造反派衝突的主要焦點。造反派由反對對聯的學生組成。最初是少數反對對聯的紅五類子女以及按純而又純的家庭標準不能入選紅衛兵的紅五類子女。隨後，由於家庭出身束縛的解脫，大批非紅五類子女湧入造反派組織。許多工農子女也脫離老紅衛兵，加入造反派。在造反派中，出身「一般」的學生在人數和政治影響力上佔了相當大的優勢。所謂「一般」家庭，指職員、教員、自由職業者、小業主、店員、中農等「勞動人民」家庭。造反派中也有出身「不好」的學生，但是比例較低。查其原因，一是真正被劃為黑五類的家庭很少。按照有關政策，有政治歷史問題而沒有「帶帽子」者，按照經濟地位定階級成分，如摘掉「帽子」的右派，其成分按職員、教員論。有「複雜海外關係」、一般歷史問題者不影響成分的劃分。學生自報出身時自然就好就不就差。二是出身「不好」的學生長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往往處事謹慎，家長也多有囑咐，因此不願輕易捲入政治運動。

直到80年代，很多領導人仍是將老紅衛兵與造反派區別對待的。1984年前後，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三種人、整黨的活動中，中顧委一位領導人批示：這些紅衛兵(指老紅衛兵)不是三種人，其中優秀的可以進入第三梯隊。

造反派在實際上不計較家庭出身，但仍不能徹底擺脫階級路線的長期影響和壓力，他們往往推舉幾個出身紅五類的學生進入領導圈子。造反派在正式文件中宣稱：「我們紅衛兵以勞動人民家庭(工、農、兵、革命幹部和其他勞動者)出身的革命學生為主體。」<sup>⑩</sup>這是造反派在出身問題上與多年來強化階級路線的政策相調和的產物。一個「勞動人民家庭」，一個「為主體」，為各種出身的學生進入紅衛兵提供了依據。雖然家庭出身的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是被造反派淡化了。

紅衛兵的家庭背景的差別甚至可以在服飾上一目了然。老紅衛兵的典型裝束是一身綠軍裝，腰繫武裝帶，象徵着繼承革命傳統，同時也傳達着社會身分的信息：革命後代、幹部子女的隊伍。領導幹部往往有革命軍人的經歷，老紅衛兵不難找到軍裝。

造反派的服裝是雜七雜八，以藍色為主色的，其中少數的綠軍裝也往往瞞不住明眼人——那不是軍裝特有的國防綠，那是仿制的贗品。造反派很難搞到真正的軍裝。

## 社會聯繫

老紅衛兵和造反派所密切聯繫的社會群體相差顯著，老紅衛兵與領導幹

部，即「當權派」相聯繫。老紅衛兵成立前後，就有一些領導幹部對他們在教育領域造反，予以鼓勵和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6月中旬的一張大字報說：「黨中央的同志堅決支持我們，……我們的許多家長都是革命幹部，也堅決支持我們，還為我們出主意，想辦法。」<sup>②</sup>就是在老紅衛兵「破四舊」，衝向社會時，很多領導幹部一方面對衝擊黨委、工作組領導體系，對嚴重違反中共中央有關政策的行為感到憂慮，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只把這些當作可以理解但應當糾正的過火行為。沒有見到領導層對老紅衛兵政治方向的尖銳批評。一些地方和基層領導幹部還一度採取支持紅衛兵，並將其造反矛頭引向黨外、引向社會的「禍水外引」的對策。1966年10月，造反派紅衛兵興起，猛烈攻擊領導幹部。11月，幾位元帥對造反派紅衛兵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和勸告。此後，由於紅衛兵運動的明顯分化，領導層對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態度也鮮明起來。1967年2月，在著名的「二月抗爭」中，幾位老一輩革命家為老紅衛兵鳴不平，對造反派憤怒斥責，愛憎分明：「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蒯大富是甚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直到80年代，很多領導人仍是將老紅衛兵與造反派區別對待的。1984年前後，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三種人、整黨的活動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一位有決策權的領導人在處理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申訴材料時批示（大意）：這些紅衛兵（指老紅衛兵、西糾、聯動的頭頭——引者注）不是三種人，其中優秀的可以進入第三梯隊。陳某某（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頭頭）是三種人，但也要給出路。

與老紅衛兵形成鮮明對照，造反派紅衛兵的社會同情來自不當權的城市居民：普通工人、文教界中等以下知識分子、一般機關工作人員。他們中的很多人寧可接受造反派學生，也不願接受老紅衛兵。許多中青年教師直接參加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 結 語

以毛澤東為首的文化大革命領導者調動群眾的不滿情緒和期待，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借以進行黨內鬥爭，實現徹底打垮、搞臭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文革領導者努力使群眾運動納入為黨內鬥爭服務的軌道，但是，群眾組織與文革領導者之間經常發生認識的差異與矛盾，群眾心目中的毛澤東常常偏離現實政治鬥爭中的毛澤東。文革領導者盡力引導群眾團結一致地走完文化大革命的全程，但是被政治性群眾團體強化的群體意識頑強地表現自己，使文革領導者不得不在文革的不同階段啟用不同的群眾組織派別，排斥阻礙文化大革命部署的派別。毛澤東認定老紅衛兵犯了錯誤，夏天的革命派變成了冬天的反革命派，造反派裏混進了壞人，要清理階級隊伍。實際上，除了文革理論和實踐的迷誤之外，問題的實質在於文革領導者與這部分、那部分群眾的政治和社會差異。

群眾組織與文革領導者之間經常發生認識的差異與矛盾，群眾心目中的毛澤東常常偏離現實政治鬥爭中的毛澤東。被政治性群眾團體強化的群體意識頑強地表現自己，使文革領導者不得不在文革的不同階段啟用不同的群眾組織派別，排斥阻礙文化大革命部署的派別。

文化大革命是有千千萬萬群眾主動、熱情投入的運動，因而僅僅從毛澤東的錯誤和林彪、江青的作用，或僅僅從黨內路線和權力之爭進行分析，都不足以作出完滿的解釋，必須研究芸芸眾生的政治活動和思潮，研究他們與其他政治因素的互動關係。本文權作一次嘗試。

### 註釋

- ① 本文所使用的「造反派」一詞，係狹義的概念，指文革初期特定的群眾組織派別，不同於70年代以後流行的、泛指一切群眾組織及一切打破既成秩序者的廣義概念。
- ② 據筆者1989年11月在北京的採訪。
- ③①⑦ 清華附中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6月24日)，見《紅旗》，11期(1966)。
- ④ 《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站出來！》，據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8月散發的資料。
- ⑤①② 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向東：〈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1966年8月初)，見《紅衛兵報》(1966年11月1日)。
- ⑥ 關於對聯產生的時間、地點，筆者據採訪及收集的資料考實。文革中紅衛兵編寫的一些大事記說：1966年7月，北航附中出現對聯，這是流傳的時間，而不是產生的時間。
- ⑦ 據群眾組織印發的首長講話集。
- ⑧ 毛澤東和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的談話，1967年2月3日。
- ⑨ 〈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67年10月7日轉發。
- ⑩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自來紅們站起來了〉，《兵團戰報》(1966年11月26日)。
- ⑪ 署名「北京一〇一中，你們的爺爺——老紅衛兵」的恐嚇信，成文時間1967年4月。此前，關於幹部子弟要掌權，「二十年後掌權」的議論並不罕見。見紅代會新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總部編輯的《大字報選》。
- ⑬ 〈我自巋然不動〉，《為毛主席而戰——三司〈首都紅衛兵〉文選》，頁306。
- ⑭①⑥ 北京家庭問題研究小組：〈「聯動」的騷亂說明了甚麼——兼駁清華附中紅衛兵「評〈出身論〉」〉，《中學文革報》(1976年2月10日)。
- ⑮ 清華大學五四戰鬥組：〈為甚麼在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很多幹部子女站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只把春來報》(1967年2月26日)。
- ⑯ 兩段引文據紅代會新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總部編輯的《大字報選》，前一段引文在1989年筆者採訪當事人時得到進一步證實。
- ⑰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宣言〉(1967年2月22日)、〈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宣言〉(1967年3月25日)，《人民日報》(1967年3月3日、3月27日)。
- ⑱ 清華附中紅衛兵：〈為有犧牲多壯志〉，《解放全人類》(1967年5月29日)。

**印紅標** 1951年出生。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碩士，現於北京大學任職國際政治系中國政治教研室講師及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學術委員。近年收集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資料，從事有關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的教學和研究。